

---

# 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诗性思维

李坟兵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诗性思维包含着维柯的诗性智慧, 充溢着人类的诗性精神。以我观物和以物观我的类比想象和创造是其运思过程的核心机制, 它就是维柯提出的凭丰富的想象力去创造的那种与生俱来的诗性思维。在此作用下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呈现的是各少数民族具有原生性的诗质文化。

**【关键词】**诗性思维; 以我观物; 以物观我

**【中图分类号】** 1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723X( 2016 ) 09 — 0130 — 06

“诗性思维”就是维柯通过研究初民的文化和思维在其著作《新科学》中提出的“诗性智慧”, 它指初民通过对事物的直接感知、伴随一定的情感和判断、凭丰富的想象力去创造的类比思维。维柯的诗性思维对人类文化的生成具有普适性, 是人类存在方式的一种共有本质。而今, 当我们谈到诗性思维, 就是指人类凭天赋的想象力去自由创造的那种非理性思维。

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是具有生态本源性的作品, 它们是与各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学, 反映的是各少数民族生命的自由样态和本真的生活世界。各少数民族正是在诗性思维的作用下, 直感创发了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

## 一、以我观物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诗性思维中, 以我观物就是以人为参照, 依凭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进行类比想象, 从而去把握和理解事物, 从人的视角去认知自然万物。

### (一) 以我观天地之初

维柯说: “人心由于它的不确定性, 每逢它堕入无知中, 它就会对它所不认识的一切, 把自己当作衡量宇宙的标准。”<sup>[1](P96)</sup> 云南少数民族的初民们也不例外, 在他们的创世神话、史诗和传说里, 初民们就是用以我观物的类比思维来解释世界的生发的。如在有关天地形成的故事中, 内容和情节大同小异, 天地的形成是被人格化了的某物或某神死后, 由其身体的各个部分化生成的自然物组成的, 这些自然物与人的身体的各部分具有某种相似性, 如头和手变成山, 坚硬的牙变成石头, 弯曲的肠子变成河流, 眼泪变成湖和海, 毛发变成树木和草地等。这就是一种以我观物的类比创造, 在初民眼中, 天地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德昂族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中, 德昂族的先民是这样来理解天地的生成的。世界是由茶树演化来的, 茶树是高度人性化的神树, 它以牺牲自己的身体来创造大地。“他们喜欢的眼泪洒到地上, 一滴眼泪划出一条小溪, 一串眼泪聚成小河流尚, 眼泪越聚越多, 汇成大海汪洋”, 他们“割下身上的皮肉, 搓碎了撒到地上。活蹦乱跳的皮肉, 把千山万水铺绿。大的

---

**作者简介:** 李坟兵(1972—), 女, 云南盈江人, 云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昆明市委党校教师, 主要从事生态批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

变树，小的变草，细细的肉筋变成青藤爬上树。从此大地一派生机，到处郁郁葱葱。”<sup>[2] (P25-26)</sup> 这里，溪水和大海是由茶树兄弟的泪化成的，因为他们认为泪水与溪水、大海具有相似的性质，都是流质，都是水；而大地上的树和草则是由茶树兄弟的皮肉变成的，这是因为皮肉有覆盖和保护的功能，就由它们来化成树和草，铺绿大地；青藤是由肉筋变成的，因为肉筋与青藤具有相似的形体和属性，所以肉筋就变成了攀爬树的青藤。又如白族神话《开天辟地》中，盘古、盘生两兄弟在造好天地死去后，盘古的“左眼变成太阳，右眼变成月亮。睁开眼睛是白天，闭上眼睛就是黑夜。小牙齿变成星星，大牙齿变成了石头，睫毛变成工竹，嘴巴子变成了村庄，汗毛变成了草，头发变成了树林，小肠变成了小河，大肠变成了大河，肺变成了大海，肝变成了湖泊……”。<sup>[3] (P11-12)</sup> 诗中，盘古和盘生身体的各部分也变成了与他们形体或属性相仿的自然万物。维柯说：“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的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用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用人的感觉和情欲的隐喻来形成的。”<sup>[1] (P175)</sup> 可见蒙昧时代，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云南少数民族的初民们就是用以我观物的诗性思维来认识世界和解释自然的生发的。在初民眼里，人与自然互渗、主客同一。

## （二）以我观自然现象

远古时，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对于一些自然现象，云南少数民族也是用以我观物的诗性思维来理解的。在解释自然现象的故事中，初民们通过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物的世界成了人的世界，一切事物都是按人的感觉、情欲或常情事理来发生的。

怒族的《天气阴晴的由来》是这样来解释天气的变化的，故事讲“古时候，上有九层天，下有七层地。天上有天国，地下有地国。在九层天里，每一层住着一位美丽的仙女，她们掌管着天上的事情。九个仙女一起开颜欢笑，天空就晴朗，一派蔚蓝；九个仙女有的笑，有的烦闷时，天空就阴晴不定，时阴时晴；九个仙女都忧伤时，天空就乌云密布；九个仙女一齐轻轻哭泣时，天空就细雨绵绵；九个仙女都嚎淘大哭时，天空就暴雨倾盆”。<sup>[4] (P100-101)</sup> 这里，九个仙女的喜怒哀乐成了天气的晴雨表，每种天气对应一种表情，每种表情与对应的天气具有某种相似性，如高兴时心情开朗，这就好比天气豁然开朗；忧伤时乌云密布，忧伤的脸色黑沉沉的好像乌云密布；轻哭时下的雨是小雨，好像泪少雨就小；大哭时下的是大雨，好像眼泪多雨就下得大。这些都是以人观物的类比想象，用人的世界解释了物的世界。再如景颇族的《公鸡请太阳》的故事，早晨公鸡叫时同时也是太阳升起的时候。对于这一自然现象，景颇族的先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传说远古时有九个太阳，人们受不了九个太阳的光和热，就赶跑了太阳。没了太阳后，大地一片漆黑，人们无法生存下去，于是大家商量着要去请回一个太阳，大公鸡担当了此任。由于大公鸡虔诚和气的态度，太阳答应公鸡，天亮公鸡一叫时，它就出来。当东方发白时，公鸡就“喔喔”叫，太阳听到了就出来，霎时大地一片光亮。但第二天，公鸡叫时，太阳没有出来。公鸡又去请，这次太阳说它没出来是因为当它出来时，大家看它，它害羞。于是公鸡给了它一包针，告诉它谁望它，就刺谁的眼。太阳说“好”，并向公鸡许诺若它今后不出来，就叫天狗吃它。从这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景颇族的先民们不但用以我观物的原始诗性思维解释了太阳出时早晨公鸡叫的自然现象，同时还解释了太阳光刺眼和“天狗吃月亮”的自然现象，这一切都是依据人的常情事理来解释的，让人也觉得合情合理。

## （三）以我观动植物

动植物是与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存在，云南少数民族的初民们在了解它们时，由于知识的匮乏，也只能是依据对自身的理解，以人的世界为参照，用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来认识或描述它们。

在白族神话《开天辟地》里，白族是这样来解释为什么啄木鸟头上有红冠、老鼠到处吃人的粮食、燕子住在人们屋檐下的缘由的。在盘古、盘生两兄弟死后化生为万物后，发生了洪水。观音到处找藏着两兄妹的金鼓，找到后，又请动物们啄开金鼓。观音先请啄木鸟并给它佩戴了红缨帽，啄木鸟啄鼓的声音太大，观音怕吓着两兄妹，就不让它啄了，白送给它一顶红缨帽，所以现在啄木鸟头顶上有红冠；其后，观音又请老鼠来啄，老鼠啄开了，观音把五谷分给它。所以，老鼠现在到处吃人的粮食；两兄妹出来后，身子连一块分不开，观音请燕子用它那比刀还快的翅膀把他们隔开。作为对它的回报，燕子可以住在人们的屋檐下。景颇族民间故事《桦桃树为什么掉皮》则是这样来解释降霜时桦桃树易掉皮、易落叶的自然属性的。故事讲霜降节树王派人来收霜降费，桦桃树假装生病说：“我病成这个样子-----叶子都掉光了，还交得起什么钱？”等第二个霜降日树王又

派人来收霜降费，桦桃树还是那么说，收税人就生气地罚它永远生病。从此桦桃树就经常生病，经常掉皮。显然，以上民间故事中的动植物特征和习性都是以人为权衡事物的标准按人的常情事理和道德伦常来解释和想象的。云南少数民族就是通过这种以我观物的类比创造，从人的世界里来把握和认识物的。

随着人们心智的发展和主体意识的增强，云南少数民族对自然有了很多了解，不再像初民那样人与自然完全混融不分了。此时，解释性的神话故事几乎已不再产生，人们也已能客观地看待一些自然物，但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还在其民间文学的创作中持续发挥着作用，成为他们诗意描述自然事物的思维方式。歌谣是云南少数民族表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在许多歌谣诗句中，云南少数民族充分发挥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对自然事物进行诗性的描绘，自然物好比就是人，人们是站在人的视角来看待物的。如傣族歌谣：“小秧鸡，谈情说爱在田边。”“攀枝花改树装，收起红伞做妈妈，生儿养女结果子。”白族歌谣：“杜鹃花，穿着一件红领褂，阳春三月才露面，全身披彩霞。”“大风你是啥变成，你一来就吼不停，没长骨头气力大，刮得刺骨疼。”彝族童谣：“喜鹊穿青又穿白，鸚哥穿的绿豆色。”在这些诗句中，人们在描述自然物时，总是以我为参照，赋予它们感觉和情意，把这些自然物的形状、自然属性和特点高度人格化，按人的世界来描绘，诗中的动植物有情有生，人们从灵动的艺术形象和诗性的世界中把握和认识了物：诸如此类的歌谣诗句不胜枚举，这种以我观物的拟人化表达是当今一切语言中最普遍的用法，它们都是原始诗性思维的延续。

## 二、以物观我

维柯说：“一切语种中的词源学的普遍原则：词（或字）都是从物体的特点转运过来表达心灵或精神方面的各种事物。”<sup>[1] (P108)</sup>这种以物观我的诗性思维是云南少数民族稍晚一些的民间文学创发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

### （一）以物代人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歌谣诗句中，傣族喜欢把小伙子比作挺拔和笔直的椰子树，把姑娘比作美丽的金孔雀、十里飘香的缅桂花或娇艳迷人的粉团花。如傣族情歌《愿做扶花的绿叶》里：最可爱的数白缅桂花，我摘一朵白缅桂戴在胸前，把可爱的姑娘深深埋在心间。<sup>[3] (P333)</sup>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召树屯》里，喃娒娜向召树屯表达爱慕时这样唱：“愿你像一棵椰子树\树高根深\我会天天坐在树下\觉得快活凉爽。”<sup>[5] (P32)</sup>彝族喜欢把姑娘比作红艳艳的马缨花，如彝族的《初恋》歌里：“遇不着如意的姑娘，找不着合适的伙伴，今日遇着一朵马缨花，就怕花蜜被采过。”<sup>[6] (P336)</sup>景颇族则喜欢把姑娘比作美丽的斑色花，如景颇族叙事长诗《羌退与勒彪》中，景颇族人民在赞美羌退时唱到：“满山的鲜花啊，斑色花最香；全国的姑娘呵，数羌退漂亮。”<sup>[7] (P110)</sup>独龙族视蔓腊花为爱情的象征，在情歌中经常把它喻为美丽的姑娘，如怒族情歌《蔓腊花》中：“蔓腊花长在深深的山等里，只要蔓腊花一开放哟，山等就显得十分的光彩。姑娘家住在高高的山寨里，竹楼虽然十分破败，盖不住姑娘一表人才。”<sup>[8] (P145)</sup>在这些歌谣诗句中，各少数民族在抒发对恋人的爱慕之情时，由诗性思维直感创发出了浪漫的情歌，歌者通过以己度物的比拟，以物代人，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个生动鲜活、富有特色的艺术形象，艺术地表达了自己对恋人的爱慕赞美之情。诗中的物与比拟的人具有某种特征上的高度相似性，说物实则说人。

### （二）用物说事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许多民间传说、寓言、动植物故事、童话等中，主角都是拟人化的自然物，创作者用以物观我的类比创造用物说事，从自然物中反观自身，以此来强化道德伦常、传授人生经验、教育人和启发人；或者是来说明一个道理、宣扬一种道德观和价值观；或来叙述一种社会现象，来表达一种思想情感和愿望等等。如纳西族的《猫头鹰的话》讲有一个人碰见一只猫头鹰，他问道：

“你的头为什么是扁的呢？”

“生活太艰难了，我成天忧，成天愁，头就愁扁了。”

“你的耳朵为什么那么多毛呢？”

“我天天挨骂，从来没有听过好话，我不愿听人家骂我，耳朵就长出毛来了。”

“你的嘴为什么开裂了呢？”

“我从来没有吃过油，所以嘴就开裂了。”<sup>[9] (P102)</sup>

这个寓言故事是阶级社会里受压迫和剥削的劳动人民借猫头鹰的外形特点，形象地叙述了自己的遭遇，有力和艺术地控诉了统治阶级的罪恶，我们从猫头鹰身上看到了劳动人民的疾苦。

又如哈尼族寓言故事《铁翎甲和乌鸦》：“从前乌鸦的毛是杂白色的极难看，它和铁翎甲（一种鸟）说好，铁翎甲帮它把毛染成漂亮的青黑色，它帮铁翎甲造窝。但是铁翎甲染好毛色以后，乌鸦借口做客一溜烟跑了。从此铁翎甲一见到它就破口大骂：‘假！假！假！’说它是个虚假的家伙，并要啄它。”<sup>[10] (P751)</sup>故事借批判乌鸦批判了不守信用之人，从乌鸦身上，我们受到的启示是：做人要诚信，不能说假话，否则会受到人们的唾弃。总之，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中，诸如此类用物说事的故事非常多，各少数民族借助诗性思维丰富的类比想象，用物说事，创造了一个个形象生动的民间故事、传说等，或批判暗讽，或宣泄不满，或说教于人。

另外，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谚语中也有大量以物观我的类比思维。谚语是云南少数民族的思维能力在较高水平时的民间文学作品，它们是各少数民族生存实践中智慧的结晶，起着训诫、警醒和传授人生经验的作用。在一些谚语中，人们通过自然界的一些自然事象反观到了自身，用形象生动的事物具象来比拟人的事件，达到教育和启发人的作用。如傣族的“滴水能穿石，蚂蚁能移山”告诉人们，做事要像滴水能穿石一样有恒心和毅力；而基诺族的“一滴水不成河，一棵树不成林”和德昂族的“独柱不成屋，独木不成林”则是告诉人们行事要团结、要顾及整体；彝族的“花朵再美，也缺不了叶子”也是强调做事要团结。各少数民族这种用物说事的类比谚语举不胜举。

### （三）借物表情表意

云南各少数民族无论是祭祀、劳动、谈情说爱、结婚、丧葬、节庆、盖房、迁居等都要唱歌，歌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亲密接触中，天天耳濡目染着各种自然景致，他们深深体悟到大自然的节律与生命的节律是如此高度契合，于是在抒发情感时禁不住由内心直感创发出大量借物表情、表意的诗句，心物互渗，“我”就是它，这也是云南少数民族以物观我的诗性思维。

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上大多都是“以歌传情”来表达对恋人的爱恋和思念的。各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年们在恋爱中表达情感时，或是由于腼腆、羞涩，或是出于自身的诗性本然，他们并不是直言唱出对爱人的情思，而总是把情真意切或极度相思的情感融入自然物象中，比附于自然，借物表情、表意。其中比附的自然是与本体具有相似性和关联性的自然，它们都是各少数民族周遭常见的自然物象。各少数民族的男女青年们就是通过这种手法，形象生动地把要表达的情思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以此来打动爱人的心。藤缠树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常见的一种自然物象，藤与树相互缠绕的自然屠胜与恋人的深切相依之情具有某种相似性，于是许多民族都喜欢用藤缠树来比喻两人的缠绵之情，以物观我，比喻生动贴切，感人至深。如瑶族情歌：“我俩好比藤盘树，生死同根在一起；<sup>[8] (P477)</sup>纳西族情歌：“歪歪的葡萄藤，爱把石榴树攀，挺挺的石榴树，等着藤来缠。”<sup>[8] (P1311)</sup>拉祜族情歌：“大青树下一裸藤，藤缠树来树裹藤，哥似青树把藤裹，妹似青藤缠哥身。”<sup>[8] (P1272)</sup>用类似物与物的亲密关系来类比情思的其他例子还有许多，如白族情歌：“苍山无雪无山景，洱海无鱼水不清，小妹无哥来疼爱，心里闷出病。”<sup>[8] (P1103)</sup>诗中

用苍山和雪构成的景致、洱海和鱼的亲密关系来类比不可分离的恋情；又如壮族情歌：“哥是竹壳妹是笋，节节要哥包到头。”[8] (P427) 诗里用竹壳包竹笋的亲密关系来类比阿哥阿妹的亲密恋情。

在这些优美感人的情歌中，歌者通过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把要表达的主题和情思融入自然和自然物象中加以活化和形象化，有些类比诗句见物见人，有些则只见物，但无论诗句中有人或没有人出现，都是用人的世界去揣度物，利用物与人的某种相似性进行种种新颖的类比，最后以物观我，用具体事物的感性形式来表征对象，使人们从生动的艺术形象中领悟到了歌者的情真意切。

### 三、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诗性思维的价值和意义

#### (一) 蕴含了维柯的诗性思维

从以上分析创发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思维来看，其思维的核心机制就是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早期阶段，由于对自然的无知，初民认知世界的方式是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和创造，无论对天地的形成、世界的本源和各种自然现象、事物的解释和理解都是从人的世界出发，都把物看成了有感觉和情意的对象。凭着这种以我观物的类比想象，他们自然而然地、顺理成章的解释了周遭的一切，云南各少数民族早期的创世神话、创世史诗、远古传说和动植物传说就体现了这种思维。随着人类的发展和文明的进程，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心智和思维有了较大的发展，人的主体意识大为增强，人们对自然已有了很多了解，并掌握了一定的自然规律和知识，很多对自然的看法和理解也已固定下来，人们已不再需要像初民那样更多地去解释和理解周遭自然界。此时，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彰显主体意识、表达各种思想情感和抒发情怀，以物观我的类比想象是此时民间文学创发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云南自然环境优美，在长期的生存实践中，各种自然景致深深地印在各少数民族人民的脑海中，由于以己度物的诗性本然，他们从外物身上反观到了自身，通过联想和想象，就用融入了人们情感体验的事物表象来表达各种思想情感和抒发情怀，自然事物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这就是云南少数民族以物观我的类比思维。所以在云南少数民族稍晚一些的民间文学作品中，我们会看到许多用物说人、说事和表情表意的民间故事和歌谣诗句。此时，新的神话故事几乎已不再产生，创世神话和史诗也早已冻结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创发中，无论是以我观物还是以物观我，运思过程都是以己度物的类比想象和创造，这种想象和创造是一种非理性的感性智慧，它与任何概念和专门化的知识无关，而只是本能地做心物互渗的比附，通过比附和联想来认识世界或表达情感。

云南少数民族的这种思维方式蕴含着维柯的“诗性思维”。维柯的诗性思维是针对当时过度的理性主义提出的，他认为笛卡尔“我思”的逻辑推演不能成为认识科学真理的标准，身与心的分离不具有构成性，理性不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原初，它只是身体感觉后来的衍化，“只有创造出来的才是真”二在此，他希望建立一种认识事物的新科学标准，倡导一种回归人类始源的认知观，使事物呈现在最初和本真的状态。这种人类始源的认知观就是在人文精神领域里表现出来的“诗性智慧”。维柯在《新科学》中并未给“诗性智慧”做出确切的定义，他只是说：“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最初和智慧，一开始就要用的玄学就不是现在学者们所用的那种理性的抽象的玄学，而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用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sup>[1] (P158)</sup> 这就是说，人类蒙昧时期，由于对世界的无知，初民只能依据自己的经验，以我为衡量事物的标尺，通过感官，凭借丰富的想象来把握世界。这种想象的诗性逻辑是以己度物的类比，“最初的诗人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这样就用它们来造成一些寓言故事”。<sup>[1] (P174-175)</sup> 维柯以己度物的类比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的世界来解释物的世界。“人在无知中就把他自己当作权衡世间一切事物的标准……人在不理解时却凭自己来造出事物，而且通过把自己变形成事物，也就成了那些事物。”<sup>[1] (P175)</sup> 另一种是通过物的世界来表征人的世界。“人类心灵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凭各种感官去在外界事物中看至小合灵本身。”<sup>[1] (P108)</sup> 云南少数民族以我观物的诗性思维正是前一种以己度物的类比创造，“从认识方式上看，人从自我出发，以自己的身体感受为基准，来体验外物和比附外物，从而认识和把握外物”；<sup>[1]</sup>而以物观我的诗性思维则是属于后一种以己度物的类比创造，“人类在以自己为中心去揣度万物时，又力图从外物中反观自己的心灵，从外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sup>[1]</sup>可见，云南少数民族

---

民间文学里的诗性思维蕴含着维柯的诗性思维，它们有着共同的运思过程，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里的诗性思维再次印证了维柯诗性思维对人类文化艺术生发的普遍意义。

### （二）涵盖了文学理论中常用修辞手法的作用

由于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创发的传统性、口头性和自由性，在民间文学的创作中，他们并没有形成象汉语文学理论中那样的各种修辞手法的说法和相关专门知识，一切创作都是在类比诗性思维的作用下，依凭情感和直觉体验进行自然创发，其间并不受任何既定思想观念和规则的影响。虽然如此，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诗性思维却内在地包含着文学理论中拟人、比喻、象征、借代等修辞手法的作用，它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机制。

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诗性思维中，无论是以我观物，还是以物观我，其间都是通过移情进行比附和拟人化，使无生命的事物充满了灵性和情感。而在汉语文学理论中，拟人法和与人相关的比喻、象征、借代等修辞手法的思维机制也是通过移情，利用人与物的某种相似性来进行具体的比拟、象征、借代等，赋予无生命的事物感觉和情欲。可见汉语里的修辞手法是原始诗性思维的延续和衍化，它们的运思过程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可能会更多地遵循一定的逻辑事理和各种既定观念意识的影响。相比之下，云南少数民族的类比诗性思维却是自然和随性的，更多凭个人的感受和情感自如地来进行类比想象。在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中，虽然没有形成有关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法的称谓和理论知识，但这并不妨碍各少数民族描述世界、记录历史、表达思想情感和自由抒发情怀：这一切都是源于他们深层心理结构中的诗性思维，云南各少数民族正是用与生俱来的这种诗性智慧创发了云南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并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眼里真实感受到的世界原原本本地呈现给世人。

### （三）建构了原生性的民族诗质文化

诗性思维是人类基因里的固有因子，在它作用下的文化艺术，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人类本真无染的心灵世界，是人类诗意生存的原乡。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诗性思维创发了具有原生性的民族文化，这个文化是具有诗质的，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云南少数民族本真的心灵世界，体现的是各少数民族极具个性和民族心理的精神文化，是各少数民族诗意存在的根基。这种诗质文化的原生性和生态性源于云南少数民族诗性思维产生和存在的方式。

云南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封闭和半封闭的生活环境中，社会发展缓慢，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没有文字，对于族群内形成的原始宗教信仰、风俗、审美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及其他一切文化都沉淀于其民间文学中，以口头传承的形式表现出来，民间文学就随着各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自然地被传承着。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是与他们的生产生活融为一体的文学，是存活于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活态文学，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歌谣，因为各少数民族都有以歌代言的习俗，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歌总是贯穿于始终，各种场合几乎都要以歌为伴，日常生活中诸如祭祀、婚丧嫁娶、谈情说爱、生产劳动甚至调和民事和打官司都要唱歌，而很多时候歌又是触景即发，因情而生，随性而发。这是他们生命的一种自然样态，唱歌的过程就是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创作和传承文化的过程。可见，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创发和传承就具体地生发在他们现实的生活场景中，在宗教仪式上、节日聚会里、田间地头、火塘旁、村社聚众闲聊时等，这使得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产生和存在的源流上就保持了文化的原生性或原生态特质，这也使得以书面传播为主的主流文化很难浸染他们的精神家园。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生发的原生性培养了诗性思维存在的沃土，使得各少数民族延续了人类亘古的诗性精神，由此创造了民族的诗质文化。各少数民族依凭与生俱来的诗性思维，一切创作都是凭本性（维柯说按本性就是诗人），自然抒发真情实意，彰显精神创造主体性，维系民族文化根基和生命活力。在这个民族的诗质文化里，我们看到的是各少数民族自由的心灵和诗意的生存。

### [参考文献]

- 
- [1]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
- [2] 德宏州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局, 德宏州图书馆. 达古达楞格莱标[M].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12 .
- [3]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 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编辑委员会.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册)[M]. 北京: 中国 ISBN 中心出版, 2003 .
- [4] 攸延春. 怒族文学简史[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3 .
- [5] 召树屯[M]. 岩叠, 等译.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79 .
- [6] 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编辑办公室. 云南彝族歌谣集成[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6 .
- [7] 朵示拥汤. 羌退与勒彪[M]. 芒市: 德宏民族出版社, 2009 .
- [8] 马学良, 李耀宗, 李绍尼. 中国民间情歌·少数民族卷[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 .
- [9] 朱宜初, 李子贤.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概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3 .
- [10] 史军超. 哈尼族文学史[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
- [11] 刘渊, 邱紫华. 维柯“诗性思维”的美学启示[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1) .